

● 兰婷 著

金代 教育研究

金代教育研究



吉林
大学
出版社

金代

教育研究

兰亭

著



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代教育研究 / 兰婷著.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5601-5140-3

I. ①金… II. ①兰… III. ①教育史—研究—中国—金代
IV. ①G529. 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5027 号

金代教育研究

兰 婷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张树臣	封面设计: 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泽成印刷厂 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张: 15.625 字数: 250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01-5140-3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 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 序 言 ——

教育，历来受中国人所重视。早在先秦时期，华夏族的先贤们就已视教育为人生大事，孟子云：“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自秦汉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以儒学教育为中心，传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和知识，成为历代官学与私学的基本模式。随着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展，不仅各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日益丰富，而且由于少数民族王朝入主中原，也使中国古代王朝的教育增添了些许少数民族特色。

金朝是东北土著女真人建立的王朝，占据中国北部半壁河山，与南宋划淮而治，国祚长达120年。在这个多民族的王朝内，女真人为统治民族，但居王朝人口的少数，被统治民族汉人则占王朝人口的多数。金朝的国情决定了国家制度是以中原式的制度居主导地位，同时兼容了部分北方民族的制度。反映到教育领域，也是汉人教育与女真人教育双重制度并行。古代王朝的学校教育主要是为国家培养“英才”，“学而优则仕”不仅是一般读书人的目的，也是国家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金朝在承袭唐宋王朝教育模式的同时，女真人为了培养本族优秀分子，从国初就十分重视教育，相继开创女真字学，女真官学、女真科举。女真人致力于本民族教育发展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对后来元朝的蒙古学教育

与科举和清朝的满学教育与科举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迄今为止，学界已出版的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中国教育通史著作不可谓不多，发表的教育研究论文更是汗牛充栋。然而，翻开各类教育史著作，金代教育研究的部分与其他断代相比，不仅分量少，而且研究也较为薄弱。金代教育研究的论文亦是寥寥无几。虽然 21 世纪以来开始关注金代教育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但目前尚未见到全面、系统研究金代教育的专著。兰婷教授从我读博士研究生时，对金代教育问题一直抱有浓厚兴趣，她在本科阶段曾系统学习过教育学，硕士研究生阶段又系统学习了辽金史，硕士学位论文即为《金代女真族教育制度研究》，她是较早地关注金代教育问题的青年学者，并有一定的学术积累。于是，与我商定她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金代教育研究》。经过四年的学习和研究，2008 年 6 月，兰婷顺利地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这部著作即是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完善而形成。兰婷在这部《金代教育研究》一书中，利用历史学和教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地研究了金代教育问题，全面展现了金代教育的水平和特色，她的研究多有独到之处，其学术贡献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是阐述了如下问题：

其一，金代的儒学教育与前代有什么不同？金朝是以女真人为统治民族，以汉人为多数民族的北方王朝。本书认为有金一代始终奉行三大文教政策，一是“尊孔崇儒”，二是“发展女真族文化教育”，三是“任用士人推行汉法”。在这种文教政策的指导下，建立了汉、女真两套官学教育体制和人才选拔体制。书中分别讨论了中央与地方汉族、女真族官学的类型、教育经费、管理体制与特点，提出金代女真地方官学不仅设有府学，还设有女真州学的观点。并从科举与教育关系的角度，论证了金代继承宋辽制开汉人科举与首创女真科举，对金代教育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促进作用。书中关于汉族与女真私学教育的分类研究颇有新意，认为可以分为家学、女真贵族官僚家塾、学者自设私塾、宦宦私塾

与自学五个类型，可为一说。金代儒学教育与前代相比，可以说是在继承中又有创新，开创了北方民族为统治者的王朝教育模式。

其二，金代统治下汉地教育事业处于怎样的水平？在女真王朝统治下汉人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经历了金初战争的摧残后，以往学界多从传统的华夷观出发，认为金代中原文化教育事业始终处于残破状态。本书除了对金代汉族教育的官学进行研究外，作者还通过对史料的爬梳，对正史中没有记载的地方办学和私人书院进行了细致考证，辑录出在地方政府主持下修建的县学33所、私人书院11所。其中对学界以往提出的5所书院进行了纠误，又新考证出6所金代书院。并论证了书院的分布特点、办学途径、建筑、藏书等情况。认为金初战乱后，北方汉地教育事业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与宋元教育相比，金代汉地教育的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都较为逊色，地方教育的普及程度远不及宋元；但与辽朝教育相比则有明显的发展。尤其是金代书院的建立和发展在我国少数民族王朝书院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元、清等少数民族王朝书院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其三，女真教育在吸收汉文化的同时如何保持女真文化特色？金朝初年女真统治者就十分重视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创立女真文字，开设女真字学校。在占领黄河领域之后，为适应对汉地的统治，女真统治集团需要提高本族文化水平，培养既通晓汉文化，又保持女真民族本色的人才。书中认为，早期的女真字学校和后期的女真官学，都采用以女真文翻译的汉籍作为教材，学习汉人经史典籍，融入女真人的思想意识对儒家文化加以理解。使女真人在了解汉文化的同时，发展了女真思想文化与女真文学，达到了借用汉文化发展本民族文化的目的。为了保持女真文人的本民族特色，金中期世宗朝开设女真科举时，规定女真进士考试“策用女直大字，诗用小字”。章宗朝又规定45岁以下试女真进士举，试骑射内容。培养和选拔了一批又一批女真“英才”充斥到国家统治阶层，对于巩固女真人的政权统治起到重要作用。金代女

真教育体制的建构、女真文化的建设和女真人才的培养都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创办民族教育的先河。

其四，金代教育的教材与教法的具体内容和特点是什么？金朝是多民族王朝，各民族文化发展程度不同，使用的语言文字各异。本书对于金代各族使用的教材进行了分类研究，按照教材内容划分为经史教材、字韵教材、文学教材、专科教材、儿童教材；按照文字划分为汉文教材、女真文教材、契丹文教材，并研讨了教材与科举的关系。对于金代各族教育实施过程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进行总结，提出金代有七大教学法，即讲授法、韵语教学和音乐辅助教学法、直观教学法、伴读法、讨论法、示范法和即时教育法。金代教材建设和教学方法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金代史籍不多，有关教育的资料更为有限。兰婷教授从正史、野史、文集、笔记、方志、金石等百余种资料中搜寻可以使用的资料，力求用较为丰富的资料在前人未涉及或涉及不深入的领域开展研究，完成了这部具有一定补白意义的金代教育研究专著。读了这部书稿后，我为兰婷在金代教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也期待她在未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的深入，不断贡献出新的研究成果。

程妮娜

2009年11月于吉林大学

—— 绪 论 ——

金朝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于十二世纪初建立的王朝。自1115年建立，至1234年被蒙古所灭，共历9帝120年，与南宋形成了南北对峙局面。金代120年的发展历程虽然短暂，但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金朝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被封建统治者作为“王政之大本”的教育，是金王朝兴衰的重要因素。因此，金代教育成为金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国内外研究成果评述

纵观中国教育的发展，金代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史中的重要阶段。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教育并不具备独立性，国家对教育的部署和控制，是以政治结构的调整为先导；有关发展、整顿教育的思想，又往往参杂在政治、经济、学术等方面的言论中。因此，记载中国教育制度发展的史料，往往同其他史料难于区分，时代愈前，这种区分就愈加困难。先秦时期，有关教育的记载主要来源于儒家经典，其中尤以《周礼》和《礼记》最为突出，某些子书也涉及到这一时期的教育；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教育的记载相对集中于正史中的《儒林传》、《职官志》、《艺文志》（或《经籍志》）、《礼志》及有关传记中。材料

相对集中，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但不足的是，这类记载并没有将教育事件与其他事件区分开来，使得教育发展史实的记载之间缺乏连贯性；隋唐到宋辽金元时期，由于在正史编撰方面出现《选举志》，使教育的记载开始趋于专门化。同时，流传下来的典籍的增多，也为教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尤其是一些大型类书的出现，不仅提供了同时期或稍近时代教育变化的历史记载，而且收集、归纳了远古以来教育发展的史实，典型代表即是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学校考》。除此之外，地方志、家谱、族谱的撰修以及数量不断增多的时人文集和疏奏，也保留了不少教育方面的材料，为这一时期教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基础。金代教育主要记载于《金史》中的《选举志》、《百官志》和《文艺传》。《选举志》记载了金代学校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情况；《百官志》记载了金代学官品秩等情况；《文艺传》及其他列传记载了诸如私学教育等方面情况。可见，《金史》是研究金代教育重要的史料来源。刘祁所著《归潜志》，记录了金代人物420余人；元好问所著《中州集》，收录了各种体裁的文章。这两部著作直接或间接地记载了金代教育的状况。金代士人文集，诸如元好问的《遗山先生文集》、赵秉文的《滏水集》、李俊民的《庄靖集》、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段克己、段成己的《二妙集》、王寂的《拙轩集》等，为我们进行金代私人办学、家学、专科教育及科举取士等方面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另外，清朝建立后，出于共同的族源关系和借鉴历史经验的现实需要，对金代历史的研究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但这一时期的金史研究，主要是针对《金史》的校勘和补正，如钱大昕著《廿二史考异》、赵翼著《廿二史札记》、施国祁著《金史详校》，李有棠著《金史纪事本末》等，而关于金代教育方面研究却很少有人问津。清代庄仲方所编《金文雅》、张金吾所编《金文最》的问世，为当时金代教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中，大量的金代汉族士人诗文序，国家发布的制造、兴修庙学记、策问以及一些碑刻、墓铭等记载，为我们研究金代私学、

地方各级儒学学校（庙学）、专科教育、科举取士、教材教法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20 世纪中国的金史研究领域开始涉及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并有一批成果问世。如金毓黻的《宋辽金史》、宋文炳的《女真汉化考略》等。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受传统的“华夷正闰之辨”的影响，“贵中华，贱夷狄”的旧观念没有得到彻底肃清，人们一贯认为少数民族野蛮、落后，在进入中原地区后，往往全面接受和吸收汉文化教育，无本民族教育可言。加之金代史料匮乏，记载该时期教育方面的史料更少，限制了学者对金代教育的研究，致使金代教育研究成为中国教育史研究和金史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

直到 80 年代，随着学术队伍壮大，研究内容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开始涉足金代教育研究领域。如张博泉、都兴智、王崇时等，他们开始对金代教育制度、金代科举考试制度等方面进行研究。此后，陆续有学者涉足该领域，并取得一些成果。具体研究状况如下：

1. 关于金代教育总体研究

在金代教育资料整理方面，有孟宪承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年版）和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年版）；尹德新主编、蔡春编著《历代教育笔记资料》（第二册 宋辽金元部分）（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 年版）。这些资料汇编，其中有关于金代教育的史料，但比较少。可见，金代教育史料挖掘的重要性。

目前，还没有出现金代教育研究方面的专著。有关该方面的研究，只是在一些通史和断代史的著作中有所论述。如顾树森著《中国历代教育制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1 年版）、张鸣岐主编《辽金元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程方平著《辽金元教育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年版）、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乔卫平著《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三卷 宋辽金元）（济南：山东

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5年版)、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修订版)(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陶愚川著《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古代部分)》(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5年版)等。这些著作中, 关于金代教育问题只是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 虽涉及金代教育方面, 诸如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女真学、私学等问题, 但只是一般的简要、宏观地加以叙述, 没有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

直接论述金代教育的论文, 有都兴智 1988 年发表的《金朝教育述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8 年第 2 期), 文章对金代教育类别、特点以及在封建社会教育史上的地位等问题进行简要论述, 指出汉、女真分别设学是金代教育尤为突出特点; 张博泉 1989 年发表的《金代教育史论》(《史学集刊》, 1989 年第 1 期), 文章对金代教育发展进程、教育思想、教育结构、教育制度、教育特点、教育对策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文章认为儒家思想是金代教育的核心, 通过从中央到地方汉、女真并行的双轨教育体制, 将儒家思想贯彻到金代社会各个层面, 对女真社会迅速封建化起了关键性作用; 吴凤霞 2005 年发表的《金代兴学与教育发展》(《史学集刊》, 2005 年第 1 期), 文章论述金代两次兴学, 即金世宗第一次大规模的兴学, 使汉、女真两套学校教育系统建立并完备起来, 成为金代教育史上官学最盛的时期; 金章宗时期第二次大规模的兴学, 是增加地方官学、调整女真教育内容并且督促各州县兴办庙学。两次兴学促使金朝到中后期探索出金代教育发展的新途径, 使金代教育颇具特色。

2. 文教政策研究

目前笔者只见到 1 篇文章, 即吴凤霞 2005 年发表的《金代文教政策探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2 期), 文章指出金代“尊孔崇儒”文教政策是在辽、宋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 但同时女真文化对儒学的认同也不容忽视。认为金代崇儒是有选择的,

与辽、宋相比，也较为彻底。从金代历史发展进程来看，金代“尊孔崇儒”文教政策实施效果、产生的历史作用应予以肯定。

相关的研究论文有，杨世文1994年发表的《金初两朝的文化政策》（《宋代文化研究》（第4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金代文化政策的转变》（《宋代文化研究》（第5辑），巴蜀书社，1995年版）。文化政策是文教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这两篇文章认为，金初太祖、太宗时期文化政策，主要以掠夺为主，到熙宗、海陵时期，文化政策实现了转变，由重武到尚文，文治思想形成；陈高华1986年发表的《金元二代的衍圣公》（《文史》（第27辑），1987年）、范寿琨1993年发表的《论金代的孔庙建置及其作用》（《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张敏杰1998年发表的《金代孔庙的修建及其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北方论丛》，1998年第6期），这三篇文章从金代孔庙的新建、重建、扩建和修葺以及对孔子及其后人封爵和给予特殊待遇等方面，论述金代对孔子及其儒学的尊崇；赵永春2000年发表的《论金代的文化政策与思想控制》（《金史研究论丛》，哈尔滨出版社，2000年版），从倡导学习汉文化、适当发展女真本族文化、允许各种宗教存在和发展等三方面论述金代文化政策。认为金朝用武得国，但很快就由尚武转向重文，实行比较开放的文化政策：既大力倡导学习汉族文化，也注意学习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既注意保留女真本族文化，又允许百家争鸣；既实行允许信仰各种宗教政策，又不限制科学的发明和创造。但同时，对不利于统治的思想和文化传播，则实行文化专制。指出金代的文化就是在这种二重性政策的指导和控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于学斌、孙雪坤2003年发表的《金代孔庙的发展、成因及作用》（《北方论丛》，2003年第4期），认为金代孔庙的发展是由于统治者推崇儒学和文治的需要，是金朝尊孔崇儒，实行文治的重要手段。

3. 官学教育研究

官学教育包括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庙学、女真官学等方面。自

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张帆1991年发表的《金代国子监钩沉》(《辽金史论集》(第5辑),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国子监是中国古代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和全国最高学府,一般就是中央官学的代称。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也不例外地设置国子监,并从国子监设立的历史背景、演变、教育情况等方面对金代国子监进行了考察;张鸣岐1993年发表的《金元之际的庙学考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6期),提出庙学即是各级儒学学校,而非像《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学思想史》等著作中所说,是金元之际出现的以祭奠为中心进行的一种暂时性的教育,类似今天的讲习班、讲座等形式的观点。这一观点,对金代官学教育的研究影响很大;张帆1993年发表的《金代地方官学略论》(《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1期),论述了地方官学发展历程及其评价,提出庙学就是官学,特别是地方官学的观点;吴凤霞2005年发表的《金代女真学的兴衰及其历史意义》(《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4期),从金太宗时期女真学设立、世宗、章宗时期女真学的发展到卫绍王、宣宗、哀宗时期女真学的衰落等方面,论述了金代女真学的兴衰,并认为女真学在提高女真人文化素质、塑造女真崇儒尚文的社会风气,以及对后世教育发展及供借鉴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兰婷2006年发表的《金代女真官学》(《东北史地》,2006年第2期),从女真设学的历史背景、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及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论述,尤其对女真官学的管理制度,从师生来源、教学管理机构、考试及学生管理制度及教学内容与教材使用等方面进行较详细地阐述。

4. 科举与教育的关系研究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金代科举制度的研究逐渐深入,问世成果较多。但其中论及科举与教育二者关系的论文和著作很少。2002年黄凤岐发表的《论金朝的教育与科举》(《北方文物》,2002年第2期)一文论述了金代各类学校、学校管理机构、师资、教材、经费和

学生来源，以及科举制度的确立与发展，科举考试的内容与科举制度的利弊。关于庙学的看法，作者认为庙学是官学以外一种新的教育形式，类似佛教中俗讲，这有待进一步商榷；薛瑞兆 2004 年出版的《金代科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一书，在第一章《绪论》中论述金代科举的历史意义时，论及到金代科举与文化教育，认为金代普遍把“父兄渊源、师友讲习、国家教养”，作为教育成才的重要途径和必要条件，以及振兴家族的希望。就是说，金代官学、私学教育为金代科举提供了重要的人才资源。同时还指出，金代登科第为官者，仍传道授业且卓有成效，亦代不乏人，这说明金代科举又促进教育的发展。但该著作只是将大量事例罗列起来，没有进一步分析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兰婷、孙运来 2007 年发表的《金代武举与武学教育》（《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 年第 5 期），认为金代承袭唐宋，于金熙宗皇统年间面向所有的女真人、汉人以及其他各族练武之士，开设“武举”，并逐渐制度化。指出金代武举促进了民间武学教育的发展，对于培养和选拔军事人才，促进军事技术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是金代科举制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他关于科举方面的研究论文，如都兴智 1988 年发表的《金代科举制度的特点》（《北方文物》，1988 年第 2 期）、2004 年发表的《金代科举的女真进士科》（《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 年第 6 期）；赵冬晖 1989 年发表的《金代科举制度研究》（《辽金史论集》（第 4 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版）和《金代科举年表考订》（《北方文物》，1989 年第 2 期）、1990 年发表的《金代科举制度下的士人》（《东北地方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王利静、关玉华 1991 年发表的《金代女真策选制度考》（《东北亚历史与文化》，辽沈书社，1991 年版）；宋德金 1995 年发表的《金代的学校考试和铨选考试》（《社会科学战线》，1995 年第 2 期）、周怀宇 1995 年发表的《金王朝科举制考论》（《安庆师院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4 期）；周腊生 1997 年发表

的《金代贡举考略》（《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莫朝迈1997年发表的《金朝的武举制度》（《中华武术》，1997年第5期）；李玉年1998年发表的《金代科举沿革初探》（《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李文泽2003年发表的《金代女真族科举考试制度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等。这些文章主要论述金代汉族和女真族科举制度的发展阶段、历史渊源、特点、考试科目、内容、中举的人数、开考的时间等方面内容，虽没有论及科举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但却为探究科举对教育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及影响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杨军2006年发表的《女真文字、女真科举与女真汉化》（《长春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一文，认为女真文字、女真科举是女真人民族自树意识的体现，女真文字加速了女真人对汉文化的吸收，女真科举改变了女真人的教育模式，使女真人通过女真文字接受汉族传统文化的教育，最终走向汉化。

另外，上世纪30年代还有学者对辽金元的科举与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如陈东原1932年发表的《辽金元之科举与教育》（《学风》2卷1期，1932.12），方壮猷1944年发表的《辽金元科举年表》（《说文月刊》3卷12期，1944年）。

5. 私学和书院研究

私学，指家学和私人兴办的私塾、学堂等，主要是启蒙教育（小学教育）；书院，指官方藏书、校书或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后发展成为治学、讲学的地方（大学教育）。关于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少。

私学方面相关研究论文有，冬阳1990年和1991年发表的《完颜希尹的家学》（《东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第2期）和《赵秉文的教育论》（《东北地方史研究》，1991年第1期）；秋晖1990年发表的《金代辽东教育家王遵石》（《东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第3期）；霍明琨2006年发表的《宋代赴金使节对金代文化教育的影响》（《满语研究》，2006年第2期）。这些文章论及到金代家学、贵族官僚家塾、汉族学者

私塾等类型的私学情况，但都是简单提及，没有深层次的研究。另外，齐心1987年发表的《略论韩昉》（《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鲁任1993年发表的《金代渤海族女政治家贞懿皇后》（《北方民族》，1993年第1期）等文章，为金代私学研究提供了一些线索。

金代书院方面，由于史料极其有限，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王志超2000年发表的《山西书院文化的历史流变》（《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介绍了山西书院从辽金到明清的兴衰过程，并简要介绍了金代山西书院的情况；王金平、张莹莹2007年发表的《山西省书院建筑初探》（《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从历史发展状况、选址、空间布局、建筑风格、装饰艺术等方面介绍山西书院建筑的特点，为金代山西书院建筑的规模和特点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另外，白新良著《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的第一章第三节和第四节中提到金后期书院的设置，但只提到书院名称，设置地点，其他情况均没有提及，且将个别不属于金代的书院也列入金代书院设置范畴之内。

6. 专科教育研究

金代专科教育主要包括医学、数学、天文、历法等方面的教育，该方面史料记载很少。同时，由于长期以来教育史著述中对于专门学术之传授，往往是存而不论，因此，目前笔者仅看到1篇该方面的研究文章，即周俊兵2003年发表的《金代医学教育的主要成就》（《河南中医》，2003年第2期），从金代官方医学教育、私人医学传授、教材教具建设等方面论述。文章指出金代医事制度基本沿用隋唐及北宋的成法，以太医院总管当时的医学。金代医学教育中绝大多数是私人医学传授，包括师授、家传、自学三方面。金代医学教育官方规定的教材，除了历代医药经典、宋代官修大型医书，还采用歌赋形式编写了医学入门教科书。认为金代医学教育大大超过了前代，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

金代医学方面研究成果较多，如高伟著《金元医史类存》（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金元医学人物》（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这些著作对金、元医学及医学家进行论述，但都没有涉及医学教育；管成学著《宋辽夏金元科学技术史》（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从数学、天文、医药、地学与水利、矿冶与陶瓷、建筑、纺织与酿酒、农学等方面论述宋辽金元时期的科学技术情况。李涛1954年发表的《金元时代的医学》（《中华医史杂志》，1954年2号）、龚纯1957年发表的《宋金元的卫生组织》（《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2号）、于敏1989年发表的《金代女真族医药卫生民俗史初探》（《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年第4期）、梁峻、梁平1995年发表的《金代医政概论》（《中国民族医药杂志》，1995年第2期）、张焱2003年发表的《谈张元素对药物的研究贡献》（《长春中医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金代医学方面情况，为金代医学教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如《金代医政概论》一文，论述了金代医官、医学机构等方面内容。

金代数学方面研究成果很少，管成学著《宋辽夏金元科学技术史》（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对金代数学有所涉及，但较为简要；钱宝琮1999年发表的《金元之际数学之传授》（《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主要论述了金代天元术发展的情况。

7. 教材教法研究

迄今为止，很少有学者对该方面进行专题研究，研究成果极少。

熊承涤著《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专门有一部分论述辽金两代学校教材，但只是简要论述教材内容，关于教材的种类、教材的印制发行等内容都没有阐述；程方平著《辽金元教育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的第